

一 奉天承运，众星捧月

公元1368年，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一年，元末农民起义军之间互争雄长的角逐已见分晓，起义军与蒙古统治者的对抗也进入生死决战的阶段，让群雄们惊异和郁闷的是，乞丐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成为笑到最后的胜利者。经群臣的“劝请”和上天的“垂示”，他选择本年的正月初四日举行登极典礼，正式即皇帝位。为向世人昭示以武力征服天下的盛大武功，朱元璋为他所开创的新时代确立了一个响亮的年号——“洪武”，1368年便是洪武元年。不过，洪武年号的确立并不意味着这位新皇帝意欲继承蒙古人“马上治天下”的传统，推行穷兵黩武的治国政策。相反，自洪武元年开始，朱元璋内心的天平已由“武功”转向“文治”。尽管此时战争还在继续，尽管武力统一的最终目标尚未实现，但随着战场的推进和向边远地区延伸，朱元璋最关心的是建立起怎样一套制度和如何组织一个有效的文官政府来建设这个用武力开创的新王朝。

中国至此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应该说，到这一年为止，这位新皇帝的功绩不可抹杀。就如同大臣们所称颂的那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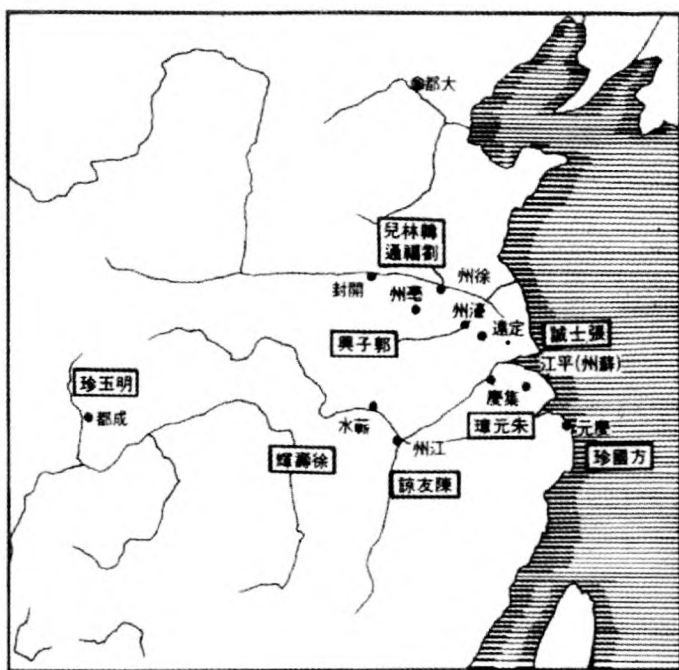
平群雄而僭乱息

扫六合而烟尘清

经历了改朝换代的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们从战乱中恢复过来，也从蒙古人落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中摆脱出来。他们拭目等待着，这位新的人主会将他们引向何处？

“明”王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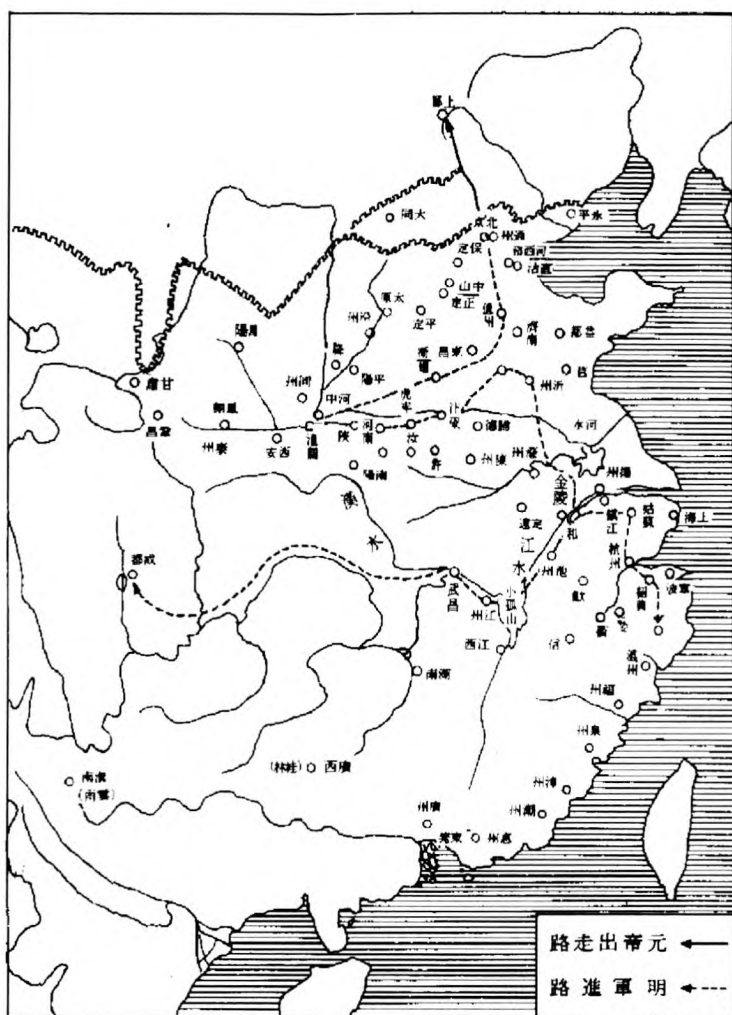
新王朝的国号被这位新人君定为“大明”，这的确是一个煞费苦心、让人满怀憧憬的名号，它包含了多层意义。用儒家的观念来理解，“明”字单独看是光明，是火。分开看是“日”、“月”二字，古礼有祀“大明”，朝“日”夕“月”的说法。千百年来，“大明”和日月都是朝廷的正祀，无论是列为郊祭或特祭，都为皇家所重视，为儒生所乐于讨论。而且，历史上的宫殿名称有“大明宫”、“大明



明太祖扫除群雄

殿”，古神话里“朱明”一词又把皇帝的姓和朝代称号联在一起。据史家考证，“明”的国号与明教也有一定关联，朱元璋的部下许多人是明教徒，明教有“明王出世”的预言，韩山童自称“明王”，其子韩林儿继称“小明王”。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说：“用大明作新皇朝的称号，第一表示新政权是继承小明王的，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共享富贵；第二告诉人民小明王已经出世，只此一家，其他全是冒牌，不要相信；第三使人民安心，老实本分，享受明王治理下的和平合理生活。”

人们深信，朱元璋以“大明”作国号，隐含着大明光天、定四海之民的雄心，也隐含着振三纲五常、以昭日月的信心。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推出的一系列的制度和政策对后世乃至今天的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今，当我们打开历史画卷又掩卷沉思时，我们不禁要问，这位开国君主开基定鼎的国策与“大明”这个国号相称吗？当我们审读历史细节，深入历史人物内心世界时，我们能不能在这些制度和政策背后发现一丝丝这位大明天子的私心和乖僻个性？



明太祖统一中国

有两个事实让身为“九五之尊”的朱元璋忌讳和深感不安，一是低贱的出身，尤其是当过和尚和乞丐的不光彩经历；二是红巾军的叛乱背景。这两件事一直在他心中隐隐作痛。朱元璋开国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以一定的礼仪和仪式证明他承继天命的合理性，借此掩盖、抹除他心中的这两块阴影。早在1366年，朱元璋就主持祭祀山川之神，禀明要立郊社、建宫宇，并议定次年为吴元年，身边的学士又为他起草了详细的治国仪礼活动规范。朱元璋的这一举措使得日后他可以以吴王的身份，而不是以一个叛乱领袖的身份登



明太祖朱元璋的两副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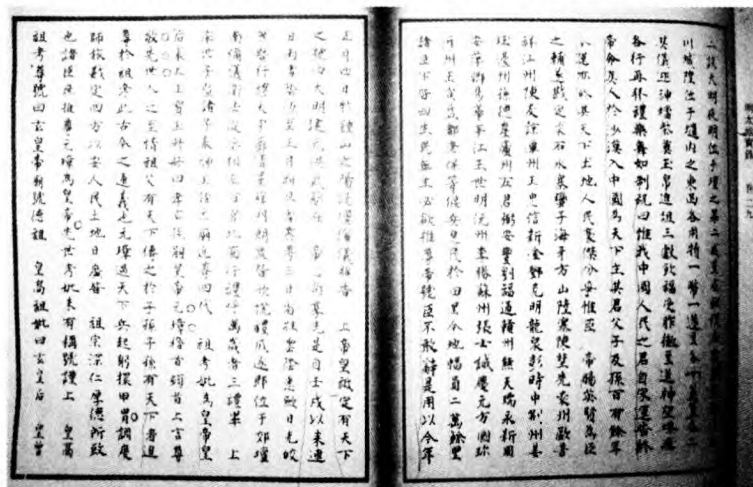
上皇帝宝座。

吴王即位不久，便有一名匠人跑到他的长官那里讲述了一个奇异的故事。匠人自称曾路遇一老人，老人非常神秘地向他说了一句隐含玄机的话：“吴王即位三年，当平一天下。”当匠人问老人的来历，他只听到一句“我太白神也”，便不见了老人的踪影。这个奇异的故事很快便被汇报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煞有介事地进行了辟谣，他说，如果太白神真的现身了，他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玄机告诉给一名小人而不告诉一位君子呢？他严肃地要求人们不要轻信这些怪诞的传言。朱元璋的辟谣行为既帮助这位“小人”传播了他的谣言，又维护了自己的“君子”形象。当这位“小人”的预言正一步步变成现实时，朱元璋的登极之礼也准备就绪了。

吴元年阴历最后一个月，朱元璋在群臣的拥戴下举行向“上帝皇祇”奏事的祭祀仪式，他在禀词中不再将蒙元的统治斥为非法，而承认他们入主中国同样是天命使然，只是经历了一百年后，其运已终。现在需要一位新的人主来继承天命。而大臣们都要将皇帝这个尊号推给他，他不得不据实禀报。由于实在难以推辞，他只好请帝祇来裁决。他说，他将以明年正月初四日为期，如果帝祇心中觉得他可以充当万民之主，就请赏赐一个天朗气清的晴天，让他举行登极的仪式，否则就“烈风异景”以示警告。风和日丽的晴天如期

到来，朱元璋“不得不”顺应天命举行即位典礼。朱元璋登极的礼仪预先进行了精心设计，每个细节都表达了他受天命、即帝位的合法性，同时皇帝和官员之间的关系也被象征性地体现出来，新皇帝被赋予高大威严的形象。而这一切都不是朱元璋的个人意愿，而是民心不可违、天意不可逆。

在登极典礼上，朱元璋身着袞冕，在胙豆、礼乐之中极其诚敬地向昊天、地祇、大明、星辰、社稷、太岁、岳镇、海渚、山川、城隍诸神宣读了祝文，后来又以这篇祝文为基础写成了登极文告。新生生的明王朝将这份登极文告通报全国并向东亚诸邦发送。祝词和文告对朱元璋秉承天意的缘由作了总结，这两份经由神圣仪式和正规程序产生的文本成为朱元璋帝位合法性的权威证明，被明代的官方文献非常细心地记录下来。不妨将祝文和文告的相关内容摘录如下：



《明实录》中的朱元璋登极文告

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其天下土地人民，豪杰分争。

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凡两淮、两浙、江东、江西、湖、湘、汉、沔、闽、广、山东及西南诸郡蛮夷，各处寇攘，屡命大将军与诸将校奋扬威武，四方戡定，民安田里。

今地幅员二万余里，诸臣下皆曰生民无主，必欲推尊帝号，臣不敢辞，是用以今年正月四日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上帝皇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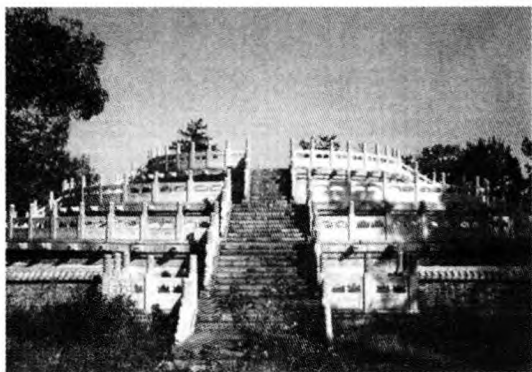
……先是自壬戌以来，连日雨雪阴沍，至正月朔旦雪霁，粵三日省牲，云阴悉敛，日光皎然，暨行礼，天宇廓清，星续明朗，众皆欣悦，礼成。

定有天下之号曰大明，建元洪武。恭诣太庙，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立大社大稷于京师。册封马氏为皇后，立世子标为皇太子。

布告天下，咸使闻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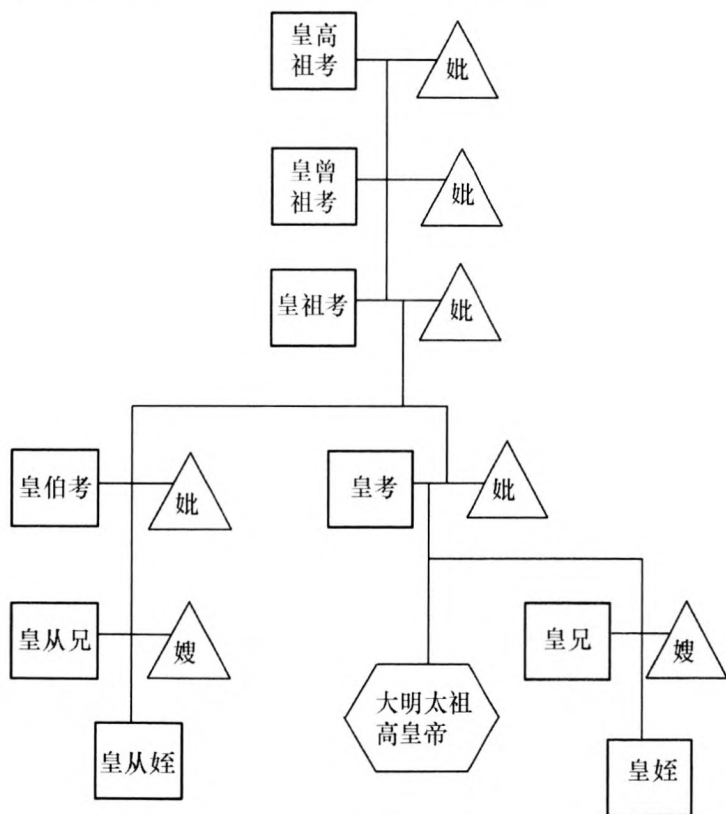
登极礼成之后，左相国、宣国公李善长率文武百官北面行礼，三呼万岁，并递上贺表一张，称赞新皇帝天生圣智，“继天而立极”，“居华夏而统承于正朔”。

登上帝位的朱元璋也正式以“真命天子”的角色来思维和行事，第一项举措便是在对元代诏书的开头语进行了改革。元代诏书开头总是用“上天眷命”四个字，他对臣子们说，这太不谦虚了，上天对人君何止眷佑，在上天面前，人君一无所能，作为上天的儿子，只能一言一行皆奉天命而行。他下令，凡大明的诏书，第一句话一律改为“奉天承运”四字。在开国初的不同场合，他对不同的接见和参拜者反复地申说，他开国定鼎纯粹是“奉天承运”，而非本人的意愿。这时，曾经与朱元璋同为争霸领袖的方国珍战败归降，方国珍被带往南京入见朱元璋，并对自己的反复无常作了检讨，请求朱元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朱元璋对方国珍表示了理解。他说：元朝气数将尽，群雄角逐，谁不想有所作为，谁不想做天子呢？但你知道吗，真命天子只能有一个，是人力勉强不来的。只要你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会责怪你的，现在我赐给你一套住宅，你就老实地住在京城吧。方国珍顿首谢恩。



方国珍台州祭天坛遗址

在开国典礼上，朱元璋追尊四代考妣为皇帝皇后，皇族的伯考兄侄也都一律追封为王，伯妣先嫂则一律追封为王夫人。后来，他还修订皇帝祭告天地的礼仪，让他的父亲——庙号仁祖——也成为配享者。朱元璋的这项措施可谓一举三得，首先，他是历史上第一位这样尊崇自己祖先的皇帝，表明他如何奉先思孝，可谓诚孝感通达于幽显，一片孝心可鉴日月！其次，他借助这些追封和祭祀的仪式将朱氏家族抬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谓，祖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孙，子孙有天下者追尊于祖考，此古今之通义也。更为重要的是，从此以后，在朱家谱系上，他再不是一名孤苦伶仃、靠当小和尚和乞丐来苟活的孤儿，而是被众多的皇祖、皇父，皇兄、皇侄簇拥着的一颗明星。以下便是朱元璋制造的朱氏皇族世系：



朱元璋追尊四代考妣世系图

皇高祖考：尊号玄皇帝 庙号德祖

皇高祖妣：尊号玄皇后

皇曾祖考：	尊号恒皇帝	庙号懿祖
皇曾祖妣：	尊号恒皇后	
皇祖考：	尊号裕皇帝	庙号熙祖
皇祖妣：	尊号裕皇后	
皇考：	尊号淳皇帝	庙号仁祖
皇妣：	尊号淳皇后	
皇伯考：	封号寿春王	
皇伯妣：	寿春王夫人	
皇兄：	封号南昌王、盱眙王、临淮王	
皇嫂：	刘氏为临淮王夫人	
皇从兄：	封号霍丘王、下蔡王、安丰王、蒙城王	
皇从嫂：	翟氏为霍丘王夫人、赵氏为安丰王夫人	
皇姪：	封号山阳王、招信王	
皇从姪：	封号宝应王、六安王、来安王、都梁王、英山王	

（朱元璋死后被其子孙尊称为“大明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

与此同时，一个有关朱元璋出生和少年经历的神奇故事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被记入《明实录》这样的国家重典之中：朱氏的先祖为颍项之后，周武王封其苗裔于邾，春秋时他们以朱为姓，世居沛国，从宋代开始其父祖屡有迁徙，元代其父朱世珍又迁到濠州钟离东乡。朱家世代力农为业，朱世珍勤俭忠厚，与妻子陈氏共生了四个儿子，朱元璋为其幼子。据称，陈氏在十月怀胎期间曾梦见一位黄冠道人从西北方来，到朱家房屋南边的麦场上取白药丸一枚放到陈氏掌中，药丸闪闪发光，并由小变大。黄冠道人对陈氏说，这是世间之美物，可以服食。陈氏按照道人的指点吞下了药丸，梦便醒了。她将这个梦告诉朱世珍时，觉得口中尚有余香。天历元年（1328年）九月十八日子时和丑时之交，朱元璋——这位未来的皇帝降生了，顿时红光满堂，自后每夜有光，邻里远远看见，以为是失火了，当他们急忙奔救时，才知是新生婴儿所致，无不为之惊异。只是这位新生儿时常常患病，一次重病之时，父母只好将他抱到附近的佛寺中求解，但寺中没有僧人，他们只好又将婴儿抱回家中。到家时却见一僧人在东檐下面壁而坐，他忽然回头示意朱世珍将孩子抱过去，用手在他的头顶轻轻摸了一下，第二天朱元璋的病就痊愈

了。此后幼年朱元璋又经常患病，但总能遇异人搭救。于是他的父母便萌生了让他当和尚以礼佛的念头，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有一天，朱世珍正在自家东室檐下那位僧人坐过的地方闲坐，朱元璋侍其侧，一位飘着长须的道长，推开栅栏径直走到他面前向他深作一揖，对朱世珍说：“好个公公，八十三岁当大贵。”朱世珍正想让座献茶，道士头也不回地走了，刚出栅栏便无影无踪。朱世珍在有生之年并没有盼到这位神仙为他预言的富贵，可是他死后人们掐指一算，朱元璋追封他为淳皇帝的那一年，他正好八十三岁。



朱元璋的老家（安徽凤阳）

发生在童年朱元璋身上的这些神异现象使得父母对他寄予了很大的希望。据说朱母陈氏出自南宋将门，陈父曾经在南宋末年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在抗元的战斗中有英勇的表现。因此，陈氏不同于一般的村妇，生下朱元璋后，尽管家境贫寒，她依旧将他送进私塾，读了大约一年多的书。辍学之后，她又凭自己的一点学识对朱元璋进行了基本的启蒙教育。朱世珍和陈氏在蒙眛之中对朱元璋有两方面的期望，一是因其神异，希望他长大后能有所出息，帮助家庭摆脱困境；二是因其多病，希望他追随佛氏，以求神佑。

朱元璋的成人并未给他的家庭带来好运，他十七岁那年，家乡遇上了旱灾、蝗灾，随之疫灾又起。父亲、长兄和母亲相继去世。悲惨的遭遇使他顺利实现了父母的另一个愿望，这一年，他进入皇觉寺当了一名小和尚，五十天后，他又与其他和尚一同被寺僧遣散去云游四方，从而开始了更神奇的经历。当他西游到合肥境内时，有两位紫衣人坚持与他相伴同行。

几天后，他染上了重病，得到了两位紫衣人的悉心照料，他们将紫衣覆盖在朱元璋身上，将他夹在中间睡觉以驱除他体内的寒气。



明代游方僧

等他能走动后，又将他护送到一个破庙里栖身，并嘱他在此静养等候三日便消失了。三天后，朱元璋果然痊愈，只是两位紫衣人并没有如约而来。朱元璋继续只身云游，当走到六安境内时，看见一位年老的读书人背着书篋艰难地行走，便上前表示愿意帮忙，老人毫不推让，将书篋放到朱元璋身上，一声不吭地与朱元璋同行。到了硃砂镇，老人在一棵槐树下坐下来，开口说话了。他对朱元璋说，我能预知未来，为许多人推过命。我看你贵相非凡，不妨将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我帮你推算一番。朱元璋报过出生年月日后，老人沉默良久，缓缓地说了几个字：无如贵命，愿慎之！朱元璋虔诚地请求指点迷津，老人详细地向他讲解了将要发生的事情。朱元璋还想问清老人的姓名邑里，以便日后求教。老人默然不答，只留下一句：此行向西北利，向东南不吉，便起身告辞了。朱元璋遂按老人的指点游历了光、固、汝、颍诸州，便回到皇觉寺静候其变。1351年，刘福通在颍州起事，1352年，郭子兴在濠州起事。朱元璋按神

示投奔了郭子兴的起义军，从此便兵威所向靡坚不摧，德意所加无远不服，童年和少年的一系列神异经历所留下的悬念也全部有了答案。

在为祖先和自己都安排了合情、合理、合法的身份和位置之后，朱元璋又对子孙进行了安排。他多次批评蒙古人不循古制，终于从古书中找出了已被郡县制取代了千百年的分封制。他说，分封亲王是守土爱民的最好的办法。周朝因为推行了分封制，所以周代的统治维持得那样久远。秦朝废除了分封制，招致了速亡的命运。汉晋以来，虽然其间治乱不齐，但都脱离不了这个道理。因此，能使天下维持长久的办法，还没有超过分封制的。洪武三年（1370年），开国战争仍在进行，在前线打仗的将士们还未论功行赏，朱元璋就急不可耐地对九个儿子进行了分封。四月初七日这一天，册封大典隆重举行，在鞭炮和礼乐声中，承制官高声宣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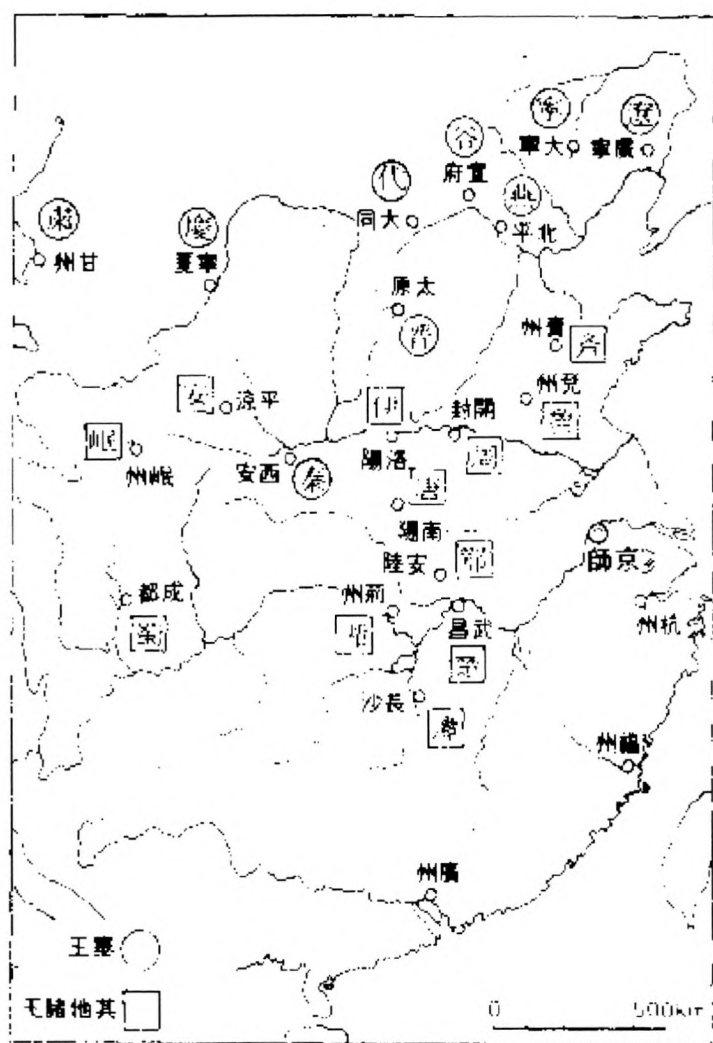
“封皇子棣为秦王；枏为晋王；棣为燕王；橚为周王；楨为楚王；椿为齐王；梓为潭王；杞为赵王；檀为鲁王”

此时，诸王子大多尚未成年。为了减少先行册封诸王的行为可能引起的曾经为朱家天下而流血牺牲的将帅们的不满，朱元璋特意在册封诸王后向天下宣告的诏书中对将帅们大加赞扬了一番。他说，朱家能有今天的基业，全靠将士们的卖力，按理应该先论武功以行爵赏的，之所以报功之典未行而先分封了诸王，主要原因是为了安抚人心，同时让诸王的尊卑秩序早点定下来。几天后，朱元璋又大宴群臣，进一步对他们解释说，现在诸皇子慢慢成人了，应该各有爵封，分镇诸国。我这样做并不是偏爱自己的亲人，乃是遵守古代先哲的制度，为天下长治久安而打算。这番解释实在是欲盖弥彰。从诸王的安排看，朱元璋将几位有能力的儿子都安置在边镇重地，他让皇子们担负重大国防责任，以拱卫朱家天下的用心已十分清楚。以后的事实进一步证明，能征善战的武将陆续被杀或被贬，他们的兵权全都转移到诸王子的手中。朱元璋共有二十六个儿子，先后册封被安置在边塞的就有九个，分别是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北平的燕王、大宁的宁王、东北的辽王、宣府的谷王、大同的代王、宁夏的庆王、兰州的肃王。这九个王通常又被称为“塞王”。内地的周王、楚王、潭王、鲁王、蜀王等也莫不占据要害之地。显然，在朱元璋心目中，能使朱家皇图永固的，朱家人比异姓人更可靠，亲王比将帅更可靠。

这些被分封的亲王都各有藩国，尽管在分封时诸王子有几年并没有就藩。但他们已被赋予了在自己藩国内很大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在军事方面，王国有守镇兵、护卫兵两支军队，亲王对这两支军队有很大程度的调度权，据此，他们一方面可以监视和遏制拥有军权的边将；另一方面朱元璋还特别规定，如果朝中出了奸臣，则诸王训兵待命，等待天子的密诏，派兵讨伐朝中奸恶。明初诸王在封国内还享有较大的人事权和司法权。朱元璋规定，王府内的文武百官，由诸王自己选任，亲王自用的文武官吏和军士，生杀予夺，听从诸王自行处置，朝廷不得干预。同时，凡亲王所居国城内和境内市井乡村人民，敢有违犯和侮慢诸王的，由亲王处置，朝廷和风宪官不得上报举奏。下图是朱元璋诸子分封的情况。

朱元璋反复向群臣解释他的分封活动只是在遵循古制，群臣们也唯唯附和，称赞分封诸王，以卫宗祀，乃天下万世之公议。岂料分封活动结束后不久，钦天监不断报告说星象异常，而且出现了“五星素度，日月相刑”的严重情况。朱元璋不得不下诏自责，请臣下直言进谏。早已有话要说的臣子们总算找到了一个向皇帝进言的机会，其中一个小县城的儒学训导叶伯臣的奏疏最有代表性。他上书直陈朱元璋执政的三大失误：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速。他指出，当前最大的端政是分封诸子，埋下了“尾大不掉”的祸根。为此，他对喜欢在历史中找依据的朱元璋讲了一番历史：汉高祖时，规定“非刘不王”，以确保刘氏江山。但是诸藩日臻强大，专恣自为，终酿成七国之乱。直到汉武帝用主父偃的建议，施行推恩令，使分封有名无实，汉室才得以安宁。一百五十年后，东晋武帝再蹈覆辙，分封诸王，成八王之乱，致使国势衰微，匈奴南下，怀帝被俘。这些历史教训都表明，分封逾制，祸患立生。这么明白的道理陛下难道看不到吗？因此，请陛下不要被骨肉之情所迷惑，要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当前，要消天变而安社稷，削藩是当务之急！

据说，朱元璋看了叶伯臣的奏疏之后，顿时忘记了自己下诏罪己，请臣民为之言过的前言，大呼说：“叶伯臣这小子想离间我们的骨肉之情，速速把他抓来，我要亲手射杀他。”后来，在群臣的求情之下，叶伯臣才免一死，但是被终身监禁。尽管叶伯臣因藐视朱家子孙的骨肉之情而险些被枭首凌迟，但朱元璋身后的事情被他不幸言中。朱元璋晚年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曾采取措施削减藩王权力，并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但一切为时已晚。



明代诸王分封地图

唯我独尊

自秦以来，中国基本形成了一套稳定的统治模式，即由皇帝总决一切，宰相率百官协助皇帝处理政务，颁发政令。各地方则按一定的行政区划设官分职，贯彻以皇帝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的意愿。这种统治方式一旦被臣民们认可，便有了很强的惯性。即使它在运行

中生出种种罪恶，迫使人们一次次起来推翻暴政，但人们还是很自然地认同这样的统治是合礼、合法的正统方式。在对旧王朝的愤怒中，人们烧了皇帝的后宫，杀了衙署中的官吏，毁了牢狱中的门窗。然而，一切被打乱打碎之后，总有收拾残局的那一天。当这一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时，人们又习惯地认为，得有一个皇帝坐在皇宫中接受群臣的参拜，得有一群官吏穿着整齐的官服坐在衙门里接受人们递交的状子，否则不成体统，与草寇无异。于是，一切很快又参照原来的样子重建起来。在传统中国社会，这种惯性的力量是无形而强大的。也正因为如此，前朝的政治制度对新建王朝初期的制度有很强的塑造作用。早在元至正二十四年，即1364年，朱元璋就在自己的统治区内设立了中书省，以李善长为右丞相，以徐达为左丞相。代元之后，政治体制和机构设置基本上都直接沿用了元朝的旧制：在中央设置中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综理行政事务，在地方，则设立行中书省，统管一省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务。

朱元璋对这套从元代承袭而来的政治体制极不满意。一个重要原因是这套制度对皇帝的制约过多。在中国历史上，皇权与相权一直存在着矛盾，大体上，自秦汉以来，总的发展趋势是皇帝权力越来越强，宰相权力越来越弱。但元朝是个例外，与宋代相比，元朝宰相的地位和权力有所上升，凡钱粮、兵甲、屯种、漕运等军国重事必须经过中书省官员和宰相过目才能上报皇帝，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则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地方权力。当朱元璋还是吴王时，他在与身边臣僚的谈话中，把元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主荒臣专，福威下移”。当时，大臣们都在声讨元朝统治者的昏庸，可能没有觉察到这句话的深远意义。明朝中书省设立后的第一任丞相是李善长、徐达。徐达长期在外征战，实际丞相只有李善长一人。李善长在开国前后引领群臣多次与这位“无意”即位新皇帝一起上演“劝进”和“力辞”的双簧，又为新皇帝即位选择吉日良辰、制订基本的礼仪，并引领群臣向新皇帝三呼万岁，递上极尽歌颂赞美之词的贺表，可谓为朱元璋的登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洪武三年（1370年）以前，朱元璋在各类谕令、诏书中一直极力强调丞相和中书省的重要，只是在吴元年不动声色地对左、右丞相进行了一次小小的调侃。按元代的礼仪，百官上朝时以右为尊，故右丞相位尊于左丞相。1364年朱元璋设立左右丞相，李善长为右丞相，徐达为左丞相，吴元年，

朱元璋下令，本朝一律以左为尊，于是一夜之间，李善长由“右”变“左”，被人们“左丞相”、“左丞相”地称呼着。朱元璋对丞相和中书省的夸赞以洪武二年（1369年）的一次谕令最为动人，在此谕令中朱元璋把他们誉为股肱、良臣。他说，古语云，“股肱惟人，良臣惟圣”，中书省是法度之本，为百司所秉承，朝廷的一切命令、政教都出自中书省。因此，作为中书省臣，一定要正直为人，不能曲意奉迎。今后如果觉得我处事不当，一定要据实直言，不能一味顺从。

韓國公李善長

長以布衣能成大業。委身戮力，贊成鴻業，遂得創符圖，列爵上公，乃至富極貴。何末年里惟庸之死，明年有

郎中王國用上言，善長與陛下同心，

出萬死以承天下，功臣第一，生封

公，死封王。人臣之分極矣，即令欲

自區不執，尚未可知，而今謂

其欲佐惟庸者，則

大謬矣。況子祺

尚公主，拜駙

馬，陛下下之

骨，善長

與惟庸弟

之親也。即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愈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南王

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如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凡為此者必有深

警相扶，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尤不可。臣恐天下聞之，功如善

長者且如此，四方同之解體也。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太祖得書不罪。



六公之首李善长

就在这次谕令颁布不久，朱元璋对中书省官员和丞相已露杀机。先是在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利用高级官僚队伍中淮西集团（以李善长为首）与非淮西集团（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宋濂、中书省右丞杨宪等）的斗争杀了刚由中书右丞升为中书左丞的杨宪。洪武四年（1371年）淮西集团的领军者李善长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新年，当这位开国元勋正筹划着在新的一年里如何好好大干一场时，新年的第二天，即洪武四年（1371年）正月初二，他收到了来自朱元璋的“问候”，说他现在年事已高，为国操劳得太辛苦了，可以退休了。李善长时年58岁。“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成为让人羡慕而又心惊肉跳的位置，谁来接替李善长也成为一个人充满悬念的问题。

据说，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在与开国功臣刘基的一次闲聊中曾谈到宰相的人选问题。朱元璋问刘基，我想用杨宪做丞相可以吗？刘基和杨宪在与淮西集团的对抗中成为好朋友。出乎朱元璋意料的是，刘基没有偏袒他的朋友，他说，杨宪有相才而无相器。大凡做宰相的人，要持心如水，凡事以义理为权衡而不能感情用事，杨宪做不到这一点。朱元璋又问，汪广洋怎么样呢？刘基说，汪广洋心胸过于狭隘。当问到胡惟庸时，刘基轻蔑地说，此人不过是一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小牛犊子，用它耕田只能毁坏了辕和犁。朱元璋说，看来当我的丞相没有人比先生更合适了。刘基仍摇头，说，我疾恶如仇，也不愿沉湎于繁琐的事务，也不是当丞相的合适人选。天下之大，何患无才，总之，这几个人的确都不适合当丞相，请陛下慎重考虑，认真访求吧。这次看似无意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此后，朱元璋再未提及此事。让刘基惊异的是，四年之后，他认为最不宜当丞相的胡惟庸被朱元璋任命为右丞相，后又升为左丞相。刘基显然没有忘记他几年前的预言，他无奈地对身边的人说，但愿我的预言失灵，那将是苍生之福！想当年，在群雄逐鹿的争霸战中，朱元璋对刘基言听计从，称他为自己的张良，照理，朱元璋不会不在乎刘基的意见，莫非是他忘记了刘基和他的谈话？以朱元璋的个性，他与重要谋臣的闲谈和提问绝非出自无意，也不会轻易忘记。那么，他向刘基咨询丞相人选的用意何在，又为何逆刘基的忠言而行呢？接下来发生的一连串事情也许会给我们一些答案。

胡惟庸上台后，刘基的厄运接二连三，刘基跑到朱元璋面前，却找不到申辩的机会。刘基因此忧愤而病。胡惟庸对病中的刘基格

外关心，他带着医生去给刘基看病，并看着刘基喝下了医生开的药，刘基喝药之后，便觉得胸中有异物如石头一般让他寝食不安。此后，又有人来探视了几次，当刘基已不能起床时，朱元璋便派车马把他送回乡下，这位能预知五百年的“神仙”就这样死在老家了。刘基的死后来成为胡惟庸下狱的重要证据之一，朱元璋在后来的各种谈话中也一再申明，刘基是死在胡惟庸的毒药之下。不过，刘基的死实在容易让人联想起另一位开国功臣——徐达的死。徐达背部生痼疽之后，朱元璋从御医那里得知此病最忌讳发物，便派太监给徐达送去了御赐的蒸鹅，并命令太监看着他吃完谢恩后才离开。徐达当着颁赏来使的面，流着泪吃掉蒸鹅，不久毒发身亡。

与胡惟庸这只小牛犊相比，刘伯温是老骥和千里马。无论是论功劳、威望和才干，朱元璋都难以名正言顺地置其于死地，但他却通过提拔胡惟庸为丞相，借胡惟庸之手达到了目的。刘基的死又反过来成为胡惟庸犯罪的证据。如果仅用“一石二鸟”来总结朱元璋让胡惟庸当丞相这步棋的价值，那实在是低估了。明初，很多重要的绊脚石都是直接或间接利用胡惟庸来搬开的。据统计，因胡惟庸的案件被清洗掉的人数已达数万。这其中包括几位像刘基一样德高望重的功臣，也包括汪广洋、胡惟庸为代表的新秀。不妨列举一些人名如下：

李善长，开国文臣之首，被朱元璋誉为他的萧何。胡惟庸案初犯时被人告发，因查无实据而得以保全。1390年被再次告发，此时主审他的官员变成了他的宿敌，77岁的李善长被迫自杀，妻子、家属和家中70余口均被处死；

宋濂，浙江金华的饱学之士，被朱元璋称为“圣人”，钦定为太子老师。因孙子牵扯到胡惟庸案中受贬而死；

汪广洋，右丞相。因曲庇同僚，没有及时发现杨宪之奸、没有及时举报胡惟庸毒死刘基之事，被贬，并于途中赐死；

陈宁，御史大夫，胡惟庸的亲信和追随者，因谋逆罪被诛三族；

涂节，御史中丞，胡惟庸的亲信和追随者，向朱元璋告发了胡惟庸的阴谋，但朱元璋仍给他加了一条“不早告发”的罪名，被处死；

秦逵，工部尚书，被牵连进胡惟庸案而自杀；

周德兴，朱元璋的老乡和少年好友，累有战功，封江夏侯，因儿子与胡惟庸案有关而被处死；